

引言

众所周知，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凭借“船坚炮利”强迫打开了中国门户，促使这个唯我独尊的古老封建大国第一次遇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和挑战。自此以后，中外关系进入所谓“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时代，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的碰撞，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激烈冲突。对此，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

思想

批

思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中学和西学所持的态度、所做的批评，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将这种冲突推向一个又一个峰顶。由此而构成新旧混杂、中西融合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显著的特点。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近代「中体西用」思想——便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大体而言，纵观中国近代历史，无论发生的事件，或大或小，或复杂或简单，无不围绕着「中体西用」思想而展开、延伸、形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不同思想文化和政治特

色。

当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刚一拉开，林则徐就从鸦片战争的切肤之痛中深切感到，必须放下“天朝帝国”的架子，了解西方世界，为此翻译了《四洲志》。魏源在此基础上扩充为《海国图志》。在该书中，魏源率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注1）这是鸦片战争后最早明确提出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政治主张。这一新思想、新原则从此奠定了近代史中西文化观的基调。

历史背景

历史背景

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中国日弱而下，西人日强而上”。面对长期以来国将不国的局面，统治阶层中的一些大官僚，如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薛福成、马建忠等前期洋务派代表；社会人士，如王韬（海外）、陈炯、郑观应等早期改良主义者，兴起了一场自强运动，在承认西方物质发达前提下，主张“学西技”、“采西学”，富国强兵，发展民族工商业。甚至在政治上有人提出引进“西制”，设立“议院”

的主张。比较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基本思想而言，尽管前期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代表着不同的阶层和阶级利益，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已经高出魏源，他们不仅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科学技术之长处，而且看到了“西技”背后尚有“西学”存在，尚有政治制度之优存在。这就是为何陈炽在对比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时言道：“泰西之所以长者政，中国之所以长者教。”（注2）所谓“政”，即指西方之议会制；所谓“教”，即指中国传统

思想

思想

思想

之纲常伦理。这是对西方认识的长足进步。

不过无论是在位的洋务派代表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薛福成、马建忠也好，还是非主流派的社言之人士也好，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们都局限在中国传统的“教”中。冯桂芬在他的改革理论代表着《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认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才是“更善之善者”。（注3）王韬也有相似的理论：“可变者器也，不可变者道也。”（注4）“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

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注5）以及郑观应“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本末观（注6）。虽然在“长技”背后他们都肯定“西学”的重要意义，但如果说用“中学为本，西学为末”来概括他们的中西文化观，这仍然只是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观点的自然延长。但这一观点演变成当时洋务派的理论基础，以及促成清末进化论思想的形成，作为传统思想向进化论思想转变的中间环节，它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不能低估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于是促发了戊戌变法运动。就运动本身而言，它是特定环境下的直接产物，但就其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政治主张可说它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扩大，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继续。只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进步思想，将「中体西用」概念摆在更高的层次里加以认识。随着以来西方各种理论的不断涌入，晚清思想

界到了二十世纪初，呈现出空前复杂的局面，也引至中西文化论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此而影响到近代「中体西用」思想的评价和定位，故本文仅以维新运动为界线，对以来「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不加讨论。

但是值得一提的，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如何评断「中体西用」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在海内外学术界被广泛讨论，看法不一，观点各异。譬如：傅伟勋先生提出的“中国为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的说法；周策纵先

生提出的“中西为体，中西为用”的主张；还有大陆学者李泽厚先生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提出

的“西体中用”的看法；以及唐力权先生仅对

用“体用”的概念解释中西学关系，而主张以

“文渊格局”的概念来取代，等等。由此可见，外来文化思想的吸收和排斥，经过十九世纪的改良思潮，二十世纪的五四运动和二、三十年代以中西文化论战，沿至今天，历时一百五十年的争辩不休，莫衷一是，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形容这几个时期的中西学论争：“不

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却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能够写成，以至结尾，平心而言是受上面提到的几位大师思想启发的结果，才激励本人做一篇历史的考察。

注释

注1：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著名的学者和先进的思想家，「中体西用」

思想

批

批

「思想的启蒙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是他在主要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来的，是他“以夷为师”思想的总纲。

注2：陈熙：《审礼》，《格致下》外篇卷下，第四一四页。

注3：冯桂芬：《东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第一五一—一五二页。

注4：王韬：《弢园文集外编·变法上》

注 5：王 概：《同 上·杞忧生易言跋》。

注 6：郑 观 应：《盛世危言·西学》，《

郑观应集》上 册，第 二 六 页，上

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原稿纸

第 页

第一章 晚清哲学思想的变

易

在讨论晚清「中体西用」思想产生之前，有必要先要了解清代思潮的概况。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近三百年的思想发展，在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可以说它是中国传统哲学总结的时期，集大成的时期；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晚清哲学思想的变易——「中体西用」思想的出现，虽然有受「西风东渐」的影响，但仍有其传统哲学的渊源。

一、形式上复古，实际上新

清代是中国历史又一个文化鼎盛时期，人才辈出，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大师和思想家。表现清代文化发展成就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和总结，对传统文化典籍作了基础性整理，从文字、声韵、标勘入手，作了大规模系统整理。其二，清代学者对两千年传统文化作了回顾、追溯，

再现了两千年的传统文化，确认了儒家思想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但是，对于儒学在漫长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两个重要时代；一是汉代，定儒家为一尊，确定了儒学的传统地位；二是宋代，儒学演变成为宋代理学。清代学者则采取批判吸收的方法继承。

明末清初，正是天崩地裂的时期，农民起义打垮了明王朝，接着清军入关，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但对思想界而言，动乱时代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环境，所以清

初思想家们借明朝统治的灭亡，对宋明理学所谓的“官学”展开激烈的攻击和批判，颜元视朱学为宋人之学，黄宗羲则把利用宋明理学来愚弄百姓的统治者称为“大害”，言道：“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注1）

清朝稳固以后，思想上的统治加强了，重新抬出程朱理学，文字狱很严重。尽管如此，清代早期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到了十八世纪得到了继续发展，以回到汉学为口号，仅对理学的考据学派，旗帜鲜明地与官方提倡的官学对

立。特别是在治学的方法上，重视客观的证据，反对主观的武断，运用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种精确谨慎的朴实无华的学风。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清朝统治经过中叶隐变阶段后，进入了危机时期，为主张回到“汉学”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扩大发展的天地，加上汉学的主要精神是强调“经世致用”，就是讲究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这就使戴震、何焯、魏源等这样的晚清学者和思想家在当时的特点环境下发挥作用，

历史背景

背景

背景

容易接受外界的“变”，认识到历史是进化的，“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注2）进而当西方的文化传入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时，魏源之所以能够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以夷为师”的务实主张。

分析了清代思想发展，虽然宋明理学仍为官学，但主流思潮清学是汉理学的，从宋学退回到了汉学。从形式上看，清学两百年的发展，是一步一步地复古，但实际上却是向前探索

，一步之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注释

注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注2：魏源：《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第四八页。

二、「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主辅说”、“体用论”

无论如何，作为几代官学的程朱之学，其

思想

对

影响

思想和作用对历代学者的影响都十分巨大的。特别是朱子学派对古代经典的注释，在元、明、清成为科举的金科玉律，使在这种“体制教学”笼罩下培养出来的学者，毫无疑问，在他们的理论思维中大量保留着程朱理学的观念。晚清「中体西用」思想的理论基础及其思想渊源，就是受程朱理学观念影响的直接产物。所以在讨论晚清「中体西用」思想时，什么是与“西学”相对的“中学”？为何“西学”仅为用，“中学”要为本？要回答和解释这些问

题就必须回到程朱理学的观念当中去。

所谓“西学”，即指西方的科学。在另一方面，与西学相对而言的“中学”，在“学”的概念和内容上，与“西学”则大相径庭。根据朱熹的理学认为，学主要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而已，（注1）并明确对“学”的轻重缓急加以说明，认为“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旨，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何学问”，（注2）换言之，朱熹以为“

断理案

批

批

学”的着重点在于“五教”或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旨，通世故。”

由于朱熹的理论对于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十分有益，而受到大加赞赏，故其学说所注的《四书》和《五经》，到了元延祐二年（公元一三一九年）成为科举之书，使儒家学说进一步家喻户晓，代之相传，而演变成社会上流行的“俗儒”。关于这个问题并非本文所议，故且不予展开。

朱子学成为官学被确立后，地位崇高，影

响为极大，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一些进步思想家如学者尽管批判、攻击理学，但对于理学中传统“学”的概念的认识是丝毫不动摇的，所以即使晚清出现了新思想，也是以中学为根本的。清末孙家鼐在议端中西学问题时就做过这样的结论：

“中国数千年来，神圣相承，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捨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

失其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注3）

由此可以看出，「中体西用」思想在晚清的出现，其理论基础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辅”说和“体用”论。

从本章前面的论述中所以发现，清代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是沿循两个途径发展的，一方面受清代思想界仅理学并兼汉学儒风的影响，注重客观实据，不拘泥于传统；另一方面是

受程朱理学（即官学）的影响，“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所以晚清哲学思想的变易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二重性。「中体西用」思想的创生，正是由于受前一种因素的影响，才得以有识时务的“西学为用”的提出；而其本身“中学为体”的观念，毫无疑问是受后一种因素（理学）的直接影响产生的。

事实上，由于政局的动荡不安，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不断造成冲击。如果说继魏源之后，早期洋务派和改良主义者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在晚清社会前期具有顺应时

务，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的话；那么当后来的张之洞也用「中体西用」思想来反对维新变法运动，这就使同一理论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涵义了，使之变成了反潮流的工具，毁灭了「中体西用」思想中的积极方面。

但同时不容忽视地是「中体西用」思想值得引人注目的一个思想侧面，它的发展、演变为清末进化论思想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我们有从晚清「中体西用」思想的鼓吹者郑观应的思

想中看出端倪。他在“主辅”说的基础上承认“本”与“末”是对立的，认为中学和西学各有其本末。他自习西文，远涉重洋，经过研究，得知西学是“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注4）因此他批评当时洋务派不辨本末：“遗其体而求其用，……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发达，果足恃歟！”（注5）

郑观应的观点所以看作是龚魏的“器变道不变”向康有为、严复的进化论思想转变的中间环节。也可以说是晚清「中体西用」思想在联系中西学、新旧学过程中开始跨入到一个高级阶段。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将放在以后章节里进行。

注释

注1：朱熹：《白鹿洞揭示》，《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正编本），卷七十四，第一三六六页。

注2：朱熹：《答陈齐仲》，同上引书，

卷三十九，第六四五页。

注3：孙家鼎：“议覆开办东临大学堂摺”，无佩之辑，“变法自强奏议”，光绪辛丑上海书局刊本，卷四，第一〇页。

注4：郑观应：“盛世危言·校刊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二三三页。

注5：[2]之引书，第二三四页。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附篇 “形上”与“形下”

二分法的经统理论

在进一步讨论和考察晚清哲学思想变化过程中出现的「中西并用」思想之前，本文以为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形而上”、什么是“形而下”的经统理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把握“形上”与“形下”二分法，对于进一步理解主与辅、体与用十分重要，对于未来本文论述「中西并用」端亦十分必要。

附篇

附

附

同时，如前所述，由于程朱之学为元、明、清之“官学”，故对“经制教学”笼罩下的知识分子影响力极大，故在探讨“形上”与“形下”的关系时，就特别着重在程朱理学的思想范畴中进行。

宋儒学中尤其从程朱学派的思想看，“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二分法，实际应因所以有“理”与“气”、“道”与“器”以及“体”与“用”等之两极性原理，可说“理”即“形而上之道”，而“气”即“形而下之器”。（

注1) 而且基本与“理气”说属于朱子的本
端，而“道器”说则表现了朱子的人世端。所
以本端端的“理气”结构关系一旦放到人世端
面，就演变成人世端的“道器”结构关系了。
因此在讨论朱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
二分法时，“道器”和“理气”就有必要一起
讨论。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道器”思想，可
追溯到《周易·系辞上传》，载有“形而上者
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注2）

孔颖达在《正义》中更根据“形上”和“形下”
二分法将“道”与“器”截分。（注3）但后
来程颢在解释二者关系时，将道器联系起来，
认为“器亦道，道亦器”，但同时又指出只要
“道”在，便“不系今与后，己与人”，（注
4）这就使“道”赋予超越自然的意义。到了
程颐才对“形而上”与“形而下”有了明确的
界限，并以“理气”加以说明，“理为形而上
之道，气为形而下之因”，（注5）“一物须
有一理”。（注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

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注7）“理则天下只有一理，故推至四海而准”。（注8）由此形成万物之根源始于唯一共通普遍之理，而理在另一个领域里又是形成个体的根源，于是建立一种“理一分殊”的说法。

理与气之关系在朱子思想中则呈现出二种形态。其一，朱子用“物”来解释“理”与“气”，认为“理”、“气”只是二物，但从“物”的角度而言，“物”本身只是“浑沦不分片各在一处”的东西。（注9）由此而言，

理与气

理

理

理与气的关系是不离的，即所谓“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即存乎是气之中”，如果没有“是气”，则“是理”也无处有以“挂搭”。（注10）

在进一步解释“理”的道理，朱子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合天地而言，只是一理”，此处“一理”就是“太极”，“太极乃天地万物之理”，同时万物又“各有太极”，并且这个“理”是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具有“先验”和“超越”的性质。（注11）

日本学者友枝龙太郎在评读朱子的思想时认为，朱熹继承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他的“理气”论是“不杂不杂”的辩证关系。对气、物而言，理既超越它又是它的内在，从理而言，虽无超越之理与内在之理的区别，但却存在“理”本身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在这种状态下，“理”的概念便出现一种双重构造。（注12）而在讨论“理”与“气”存在的先后关系时，朱子以为，“纵使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只在这里”，（注13）这就是说具体的存

理 气

理

理

在物有成有毁，但是形上的理却是永恒不灭的，表明了理的超越性和绝对性。因此，在这个世界，“理”与“气”虽然不杂，但是推究它的根源则是太极（即超越之理），在天地生成之前，这种超越之“理”就已经独立存在了。于是便产生了朱子“理生气”、“有理是理的生是气”的“理生气”关系。（注14）但另一方面，“气”虽是“理”所生，但是“气”却在“理”不变的情况下，成为“昏明杂驳”，所以在朱子的“理气”论中，理与气不惟有分

20X20=400

离的可能，也有理不妄而气不妄的可能。（注1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朱熹思想中理与气的截分，而仅之说明在“理生气”的特定前提下，朱子思想中已蕴含着二者分离的可能性。大体而言，朱子思想中的“道器”与“理气”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道与器的关系则近似于理与气的关系。

由此可见，大体上朱子学中的“道”与“器”是不离的关系，但并没有“道器合一”的含义。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言，

“道”就是“道理”，而“器”就是“形迹”。事物都有“道理”，也都有个“形迹”，所以“有道须有器”，“有器”也“须有道”。虽然事物之都有其理，但是事物不见而其“理”难知。欲见此“理”，须要“真”实于事物上见得这个道理”。（注16）至于“大学之道曰穷理，而谓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实处穷境”，而说“格物”，便是就“形而下之器”上寻“形而上之道”。由此可见，“道”与“器”“元不相离”。（注17）朱子并就程

NO

类的意见加以中谛，认为“器亦道，道亦器”，二者有“分别”而不“相离”。“道”没有离“器”，“道”也只是“器”之“理”，“理”在“器”上，“理”与“器”之间“未尝相离”。（注18）但所谓朱子之“道”具有超越的性质，这是由于“道”与“理”、“道”与“太极”之间是相通的。朱子曾清楚意识到：“道是太极”，（注19）此一“形而上太极”的“道”在三皇五帝之前便已存在了，且后来成为各时代圣贤的教旨。“道”的超越性在此

—— 理 气

—— 理 气

—— 理 气

就使“道”与“器”之间有了明显的分离。

正如在研究万物生成时，朱子认为“形而上之道”的“理”是“生物之本”，而“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以有性”；至于“形而下之器”的“气”则是“生物之具”，而“人物之生必禀此气，然以有形”。（注20）而就万物以一理为根源的意义上，是平等的，但由于气的作用，便有了差别。人虽然也和其他自然物一样，有理贯穿着，但人是禀于最优秀之气，所以为万物之灵长。（注21）而这种平等与差

别的关系，不仅存在于一般人类与自然物之间，也存在于人类相互之间，这就使朱子的“本体论”与其“人性论”融为一体。朱子在《玉山讲义》中对此有明确阐述：

“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秉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秉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秉其留浊之气，又

照 耀 卷

揖

四

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

是皆气秉物欲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也。

……而凡吾日用之间，所以去人欲复天理者，皆吾分内当然之事，其势至顺而无难。”（注22）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朱子的思想中，虽然理与气的关系存在着不离与分开的两种可能性。但是就人而言，最高层次的理就是圣人之道。当圣人之道成为追求的目标时，就成为“亘古亘今，常在不灭”的永恒真理，（注23）

这就使理的恒常性与超越性特别突出。那么究竟理（或道）在社会规范层次上的具体体现如何？这就是理的另外一层意义，即“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朱子曾在《读大纪》中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但理“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帝”，（注24）更具体更直接一点就是“自天生民，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叙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则天理之理固已无不具于一人之身矣。”（注25）在此基础上“即曰

理

理

理

用而有天理，则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间，应对、酬酢、食息、视听之顷，无一而非理者，亦无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丧矣。

（注26）由此可见，除了“宇宙之间”的“一理而已”，具体的“理”就是朱子谈得最多的“三纲五伦”为核心的“恭顺脩理”。

自心程朱之学成为科举之书以后，亦即从元世祖开始（公元一五一五年）开始，经过明、清两代，与既有传统的相符合，地位逐渐稳固，以至约定成俗，不容怀疑，致使历代学者

放弃了个自对“理”的探究，顺随其程朱之学，若加以实践，于是导致原本已具有绝对化的“理”，逐渐通过体制教学的运作，落实到实践中，就使得“三纲五经”的“恭顺编理”越来越社会化，民信化了。至明以后，由于君主与朱子学者的大加倡导，程朱理学的发展使理与道所具的恒常性和超越性的趋向得以确立，并逐渐演变为体制教学和社会上的固定意识形态。因此，在探讨晚清出现的「中学为体」思想时，为什么全提出“中学为体”，就不难理解了。

历史背景

批

评

了。

至于“体”与“用”的概念，虽然其最早源于儒家思想，但宋以前并不盛行。根据陈荣捷的研究，朱子真正奠定了“体用”的基本观念。通过从心面对朱子思想“道器”和“理气”的探讨，从果种意义上看，朱子解释“体用”概念仍是以“形上”与“形下”二分法作为其不矛盾的。具体地说，朱子是透过“理气”二无不杂不离的方式来解释“体用”的，既有体斯有用，即用而见体，而体即是体，用即是

用，不能混淆。(注27)故他认为“体”就是这个“道理”，而“用”则是它的用处，如“耳听”、“目视”便是“体”，而“听眼视物”，用耳听声则是“用”，(注28)从而使“体”有了“理”的意味了。除此以外，朱熹有时将“体”视为事物本身，而“用”就是事物的运用，如“耳是体，听便是用；目是体，见是用”，水是“体”，水的流或止则是“用”。(注29)故他在以“体用”说明仁爱时，认为仁是爱之“体”，爱是仁之“用”，而爱自仁出，

理 气 论

理

理

非常明确地解释了体是用之源的道理。(注30)

另外，在朱子思想中，除了以“理气”二元不杂不离的方式来说明“体用”的关系外，也有类似“理先气后”的“体先用后”以及“理生气”般的“体生用”，而且体在一定形式下，是相当于理的。事实上，在朱子的“体用”观念中，有两种形态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而且先后被借用来讨论晚清的中西文化问题。首先是“互为体用”的关系。朱子在讨论“阴阳”与“体用”时指出，就阳而言，则阳就是“

“体”；而阴就是“用”，反之，就阴而言，则阴就是“体”，而阳就是“用”。这就置“体用”于前后无所定和互为表义的状态中。但是同时朱子也承认，当“合万事为一大体用”时，“宝见在底”便是“体”，而由“体”仁来生的便是“用”。（注31）其次一种是朱子认为的“体”有自身的“体用”，而“用”也有自身的“体用”，如仁为“体”，义为“用”，而仁自有仁之“体用”，义也有义之“体用”。（注32）

原稿纸

第

页

在讨论心之“体用”时，朱子便其思虑中的“理气”与“体用”有了较清楚的关系，并认为“性是未动，情是已动”，而“欲则是情发来底”，“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此言性也；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注33）对朱熹自身而言，由于人生成之时，除了圣人以“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外，其他则因并非禀纯然的清明之气，故为物欲所累，乃至为物欲所蔽，故主张“去人欲，复天理”。（注34）未发既是性，而性又

是理，故起心动念无问题，但是已动之后，由于那“清明之气”的作用，并非“中节”，故朱子主张在未发之际，便为用敬的功夫加以涵养，使之发而“中节”。（注35）这样一来，你本身是性，也就是理，且是不动的。同时，用既是情，而由情发来的欲，如果是好的，“则天却天理，如水之壅决，无所不害”。（注36）所以从朱子的思想体系观之，“去人欲”的功夫是必要的。那么你既是性（理），且又不动，这就使“你”带有不变也不须变的意味。

反之，用既是已动的情，便带有变动的意味，而通过人的作用，用的结果便由不“中节”而“中节”，使“用”在“你”的不变下具有了可能性。

其实，对朱子而言，当“你先用你”或“你生用”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有你才有用，这就使“你”与“用”比较之下，你被视为根本的、主要的、第一性的；而用则是派生的、从属的、第二性的。尤其至刚清时代，当你被看作理之时，在官定程朱之学理的绝对化下，

你就会被赋予绝对的含义了。

根据现有的研究表明，自从北宋胡瑗引周
 鼎教“体用”连璧的概念，提出“刚体达用”
 以后，历经邵雍、张载、二程，到了朱熹解释
 经书时，才使其概念得以确定。而胡瑗的弟子
 刘彝更是最早说明“体用”范围的人，他在宋
 熙宁二年（即己一〇六九年）解释“圣人之道”
 “时指出，“圣人之道”包括三个内容，一是
 讲“体”，象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皆属历
 世不变之“体”；二是讲“用”，“举而措

斯稿纸

据

四四

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子皇极者”就是“用”，
 也就是所谓的经世济民，用儒家学问来建
 立政治社会秩序；三是讲“义”，即指诗、书、
 史、礼、子、集等。（注37）由此可见，“体”
 “的范围被偏重在三纲五常和道德教化领域，
 具有不变性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而“用”明
 显侧重于经世层面。到了明末清初，“体用”
 的范围在原来的基础上就更加清楚和具体了。
 直到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出现，
 就更进一步说明了“体用”在社会实践当中

的作用。

通过以“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简单讨论，及它的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关系的初步涉及，已有所清楚地表明了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出现的根本缘由和顺时势而表现出的基本特色。

综上所述，朱子学中“理”落实于社会层面所展现的三纲五伦之“恭顺伦理”的绝对化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并且与刘蕡赋予“体”于“纲常名教”之中异曲同工。故可说“体用”

思想

批

批

端。“理气”论、“道器”论不仅在结构上类似，彼此之间也有相当程度的相通。同时，落实于社会实践之时，体、理、道的范畴也几乎一致。而器本身只是气的具体化，彼此的关系显而易见。以此来考察和验证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其“中学为体”的内涵也不与之相应，并易理解了。因此，晚清思想家在经世观点下，以不影响圣教的存在的前提下，使用的范畴便具有了矛盾性。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诞生，正是基于当时特殊的中外

关系而采取的一种赋予弹性的办法。

原稿纸

第 页

注释

注1：朱熹：《答黄道夫》，《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第一〇三九页。

注2：《周易·系辞上·注》，《重刊宋本周易注疏附标刊记》，台北，艺文印书馆，一九五五年版，卷七，第一五八页。

注3：同注。

注4：程颢、程颐：《遗书》，《二程全书》，京都，中文出版社，一九七

年稿纸

年稿纸

九年版，卷一，第二八页。

注5：赤塚忠（日本）：《儒家思想的历史概观》，宇野精一主编，洪顺隆译，《中国思想之研究（一）儒家思想》，台北，幼狮文化公司，民国七十二年版，第四五一四六页。

注6：程颢、程颐：《遗书》，卷十九，第一四八页。

注7：同注，卷二，第三四页。

注8：同注，第五〇页。

注9：朱熹：《答刘叔文》，《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第七九九页。

注10：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台北，汉学文化公司，民国六十九年版，卷一，第一页。

注11：同上引书，卷一，第一页；卷九十四，第九四二页。

注12：友枝龙太郎（旧本）：《朱子》，宇野精一编，前引书，第一四七页。

注13：《朱子语类》，卷一，第二页。

四 编 卷

册 四

注14：同上注，卷一，第一页；卷四，第二九页。

注15：钱穆：《朱子新学案》，台北，来来社，一九六九年版，第四十页。

注16：《朱子语类》，卷七十五，第七七〇页。

注17：同上注，卷六十二，第五九五页；卷七十五，第七七〇页。

注18：同上注，卷七十七，第七八三页。

注19：同上注，卷九十四，第九四九页。

注20：朱熹：《答黄面夫书》，《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第一〇三九页。

注21：《朱子语类》，卷四，第二三页。

注22：朱熹：《玉山讲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第一三六八页。

注23：朱熹：《答陈同甫》，《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第五七七页。

注24：朱熹：《读大纪》，《朱文公文集》，卷七，第一二七六页。

断 断 断

断

断

注25：朱熹：《经筵讲义》，《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第一三页。

注26：朱熹：《答廖子晦》，《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第七七四页。

注27：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三二四一五页，台北，学生书局，民国七十一年版。

注28：《朱子语类》，卷六，第四一页。

注29：同注。

注30：同注，卷二十，第一八七~八八页。

注 31: 同 > 注, 卷六, 第四一页。

注 32: 同 > 注, 卷六, 第四九页。

注 33: 同 > 注, 卷五, 第三八页。

注 34: 朱熹: 《玉山讲义》, 《朱文公集》, 卷七 + 四, 第一三六八页。

注 35: 朱熹: 《已发未发说》, 同 > 引书, 卷六 + 七, 第一二三四页。

注 36: 《朱子语类》, 卷五, 第三八页。

注 37: 黄宗羲: 《安定学案》, 《宋元学院》, 卷一, 第一七页, 台北, 世

图 书 局

世

图 书 局

界书局, 民国五十年版, 另有参考
余英时: 《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
释》, 《历史与思想》, 第一二九
页。

第二章 魏冯与「中体西用」

思想的确立

公元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给中国的打击太大了，使中国人不分上下都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而西方文化伴随着西方武力传入中国，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和潮流。闭关锁国不可能了；抱残守缺势必会落伍，而时又无新例发生的新变化，当时中国的一个著名学者和先进思想家魏源提出了一个总对策，奠定了早期「中体西用」端的基本思想。

断 断 断

据

据

一、魏源的“以夷为师”的思想

魏源的学问十分渊博，在经学、子学、历史、地理各方面都有著述。特别是在鸦片战争时期，他不仅作为裕谦的幕府参议抗英，也是当时比较了解西方情况的人。

魏源的思想主张主要在《海国图志》和《圣武记》中表现出来。他提出的“以夷为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中国长期实行闭关主义政策，固守为“天朝”的封建统治而言，不仅未继续研训陈之旧，再一次强有力

的呼吁，而且承认了西方有比中国更进一步的文明。这就是他所认为的“长技”。他指出：“表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注1）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以表为师”的具体措施，他认为：“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表目一二人，分授西洋工匠习，司造船械。并延西洋炮师，司教习船澳炮之法，如钦天监表官之例，而造闽粤巧匠精长以习之。工匠习其制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注

四 魏源

批

四

2) 如此这样，他以为便而“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表”。（注3）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魏源的“富民”思想。在他提出设厂制造兵船、枪炮的基础上主张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由军事工业开始，逐渐转变为民用工业，由国强而至民富。造船厂生产了足够用的兵船之后，就所制造商船；枪炮厂制造了足够用的枪炮之外，就可以制造各种机器，“凡有益民用者，皆所于此造之。”（注4）

从上面的讨论中不可以发现，在魏源的观念中，从“师夷”到“富民”思想，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迈出了一大步，关键性地指明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出路，而且不从他全部思想中窥见早期洋务派思想的端倪。不过，魏源只是从现象上认识到制造机器和使用机器的重要，尚未真正明白“西技”背后有“西学”的存在，也没有把接受“西技”与中国传统体制、思想、价值观念有意识地加以关联而纳入同一思想体系当中加以思考。因而，他虽有「中体西用」的意识，但确似乎不具备「中体西用」完整的思想体系，仍只是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

不过无论如何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点来看，其见解距离越过“长技”去求“西学”已经非常接近了，况魏源以前的哲学思想就已经意识到：器是万变的，道则万古如斯，“气一元二气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势变而道不变”。（注5）对于社会的发展变化，他甚至指出：“变

古愈厉，使民愈甚。”比较传统的思想，但却是一个有革命性的说法。（注6）

无论如何，处在中国历史与转折点的时代，魏源的进步思想，不仅能够对事物有比较正确的清醒的认识，也能够对事物提出比较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对策，这在当时兴起的转折过程中起了根本的进步作用。

照稿錄

照稿錄

注释：

注1：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
策》三。

注2：同注。

注3：魏源：《海国图志》，卷一，《筹
海策》三，《议战》。

注4：魏源：《同治引书》，卷二。

注5：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三。

注6：魏源：《同治引书》，卷二。

原稿纸

拼

拼

二、《校邠庐抗议》及其作者与「中体西

用」思想的雏形

《校邠庐抗议》一书成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与咸丰八年至十年（即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作者是晚清另一著名思想家冯桂芬。他的主要改革理论和思想均表现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

冯桂芬的思想受清代经世先驱顾炎武的影响很深，且又曾师事林则徐，对“天文、地舆、兵利、盐铁、河漕诸政”（注1）十分关心，

显示出其“经世致用”的思想。继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之后，面对西力的继续东渐，他不仅同意魏源的主张，且更加明白地提出“采西学”的建议，在使方时的“夷务”思想转为“洋务”思想过程中，他比魏源更跨进了一步。他在《采西学议》中，对于“采西学”的背景和方式做了说明。他主张“学问者”是“经济所从出”，而如何“出于真而胜于真”则是“当时论学的一要务”。他举司马迁因为孝廉与时序相近，“信史相类，

议卑而易行”等要素，而在“论治”时主张“法仿王”为例，认为此时“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政富强”，也是“相类而易行”，故主张仿效法仿王之意而“鉴诸国”。对于此一“鉴诸国”以采西学的意见，冯桂芬并不认为仅此而足，而认为应该“以中国之编章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才是“更善之善者。

(注2) 由此可见，由冯氏在《东西学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编章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想法，非泛泛之论而已，有以看

明 强 盛

三

四

作是东西学的纲领。

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内容加以分析，他在比较中、西之后，虽然列举了“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等方面，却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是在“仅求”而已，只要“望与振刷纪纲”，“一转移间”便可达成。(注3)

至于有关“军旅之事”中，“有得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注4) 表面上看冯桂芬与魏源在对西方之所长的认识似乎很类似，但

深究之始所以发现，冯桂芬似乎已意识到“船
 坚炮利”背后有制造这些器具的原理和方法的
 存在，所以他主张进一步学习西方的“历算之
 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等西学，（注
 5）并认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诸学，
 “皆得格物至理”，而“輿地书备列万国山川
 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既然“列国
 就其有人”，那么“大一统”的“中华之邦”
 怎么可以没有，（注6）故他主张加以学习。

如何学习西方的长技与西学，冯桂芬一方
 面主张在科举中加设一科，另一方面则主张设
 学校来传授西学。他主张在“通商口岸”设“
 船炮局”，聘请西人教授，“工成与奏制无办
 者”，就“赏给举人”，所知举子的“一体会
 试”，如果“工成”能“出奏制之上者”，就赏
 给“进士”，而“一体殿试”，（注7）来鼓
 励学习“奏之长技”。而为了“采西学”的目
 的，他又主张在广东、上海设“翻译馆”，
 招“选近郡十五岁以下文童”，“住院肄业”，
 聘请“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同时并延

“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算学”，并“兼学算学”。（注8）另外就纸人在道光年间所进“十余种”书中，“择其有理者译之”，“由是而称（历）算之术，而格物之理，而尚象之法”，加以“兼综彙贯”。（注9）诸“文童”肄业三年以后，于“诸图书”能够“应口成诵”者，便所以“补本学诸生”，如果进一步而“神明变化，能实见之行事者”，便由“通商大臣”奏请，“赏给举人”，如此因中国“多举凡”，一定有“出于表而轻胜于表者”，又因“学

问”是“经济”所从出者，故将此视为当时“编学第一要务”。（注10）

另外，前面已经提及，早期的“经世学者”基于“适用”的考虑已能接受一些西方的技术。而冯桂芬除了“轮船”、“火器”以及前述的种种西学，并主张采用西方新式的“砌法”、“海港刷沙法”、“农具”、“织具”、“机轮”和其他“有资以治生”和“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注11）

由以上的讨论中，可以了解冯桂芬所谓的

“诸国富强之术”，已经是包括西技和西技背后的西学，尽管如此，它们在冯氏的思想中仍居于“辅”的地位，而中国传统的伦常名教，才是原本。可见冯氏所欲采用的西学（包括西技），还只是在用的层次上，而且只是包含于用之中而已，用的范畴中仍有许多是中国固有之物，这是必须加以注意的。另外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旧体制教学沿至清代仍是以“圣人之道”的中学为核心，所以体现在冯桂芬的思想中的三纲五纪之“恭顺伦理”就特别突出。

展现。他将“中体”核心的伦常名教视之为“原本”而加以肯定，同时又把诸国富强之术视之为“辅”而加以强调，故可以肯定正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已勾勒出了「中体西用」思想的雏形，甚至可视之为出现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体西用」思想的正式诞生。

在认定冯桂芬所谓的“采西学”仍在用的层次上之后，有必要再讨论其思想的一些争议点，以便对他的「中体西用」思想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冯桂芬曾说道：“法苟不善，虽古先

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注12）

有的学者过去曾认为此处所谓的“法”，包括“政法”和“礼法”，如是这样则冯氏思想似乎就不能用「中体西用」思想来加以定位。但是总括冯氏的世界观，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冯氏在此所言的“法”，是指“养贫、教贫=局”，从“制度”层面来考察，又与张澂提出的晚清经世思想“治法”的范畴吻合，并未涉及“根本大法”，更不损及清朝的“皇朝体制”，所以其思想不能以包括“政法”、“礼法”

断 疑 案

册

四

来进行推论，何况对于以“中体”为核心的“纲常名教”而言，也并不矛盾，更何况冯氏自己认为，此“法”不过“操三代圣人之法”之“末”，乃因“礼失而求诸野。”（注13）

而就冯氏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主张，虽“屏以奏说”，而“要以不畔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可见中西之见仍然存在。就此而论，也难说冯氏有超越「中体西用」思想之处。

其次，就冯氏的经世思想理路而加以讨论。

理论²，作为一个经世学者，若能够“资以治生”和“有益于国计民生”，也就是说能“致用”的话，只要不损及什么，实在没有不采用的道理。而冯氏认为当然“夷务”是国家的第
一要政，特别经过英法美俄“四国联军”的冲击（即一八五八至一八六〇年间），就更加感到自强的重要性，认为“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纵使“无事”也“不为祸”（注14）。可见“自强”就成为冯氏“经世策”的重点之一。由此出发，冯氏认为“当时诸国同时并

域”，而有“独能富强者”，故有效“法西王”之意而“鉴诸国”，（注15）本来其“经世”思想所归结于此，惟他更进一步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注16）由此可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是其第一价值所在，更可见其「中体西用」论的立场。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很清楚世所以发现在冯氏思想中“西学为用”只是停留于“器物”层面，而其“中体”的范畴则是“伦常名教”

。至于“制度”究竟在其思想中属于“体”的范畴，还是“用”的范畴，这个问题在冯桂芬的思想中似乎是“模糊不清”，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脉络中，这却是一个深具发展性的大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的认清已经是清末变法维新运动以后的事了。虽然冯桂芬的思想如果再进一步，便可能跨进变法思想的境界，但他毕竟受到时代的局限；受到自身“体制教学”的影响，所以他只能够停留在他现有的思想高度，这在当时能透过西方的长处而意识到中国

思想

批

批

的不足，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

总之，从《校邠庐抗议》的全部内容来看，冯桂芬将法、政诸西学引进中国，其思想和主张有被后人更往前推进的可能，这不在本文以还的章节中看出端倪。

注释

注1：赵尔巽等编纂：《冯桂芬传》，《清史稿》，台北，洪氏出版社，民国七十年翻印本，卷四八六，第一

三四三八页。

注2：冯桂芬：《采西学议》，《扶和庐
执议》，卷下，第一五一—二页。

台北，文海出版社翻印本。

注3：冯桂芬：《制洋器议》，同书
，卷下，第一五五页。

注4：同书注，第一五六页。

注5：冯桂芬：《上海设立同文馆议》，
同书，卷下，第二—五页。

注6：冯桂芬：《采西学议》，同书

四

册

卷下

，第一四八—九页。（卷下）

注7：冯桂芬：《制洋器议》，同书
，第一五七—八页。（卷下）

注8：冯桂芬：《采西学议》，同书
，卷下，第一四九—五〇页。

注9：同书注，第一五〇页。

注10：同书注，第一五一页。

注11：同书注，第一五〇—一页。

注12：冯桂芬：《收贫民议》，同书
，卷下，第一〇—页。

NO

20X20 = 400

注13：同①注，第一〇——一三页。

注14：冯桂芬：《善馭夷议》，同①引书，卷下，第一六一——一六页。

注15：冯桂芬：《采西学议》，同①引书，卷下，第一五一——一五二页。

注16：同①注，第一五一——一五二页。

附论：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在本节中有必要稍带一提，与冯桂芬《校

西学

书

比

和序抗议》同年代的另两部引人注目的书是太平天国运动第一领袖人物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不能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中没有人了解西方，了解西技；就如同不能把曾国藩主张引进西技仅仅是为了富国强兵，自强自立这一目的，而忽视其企图藉此镇压农民起义、强化封建统治的另一目的。

洪仁玕（公元一八二二——一八六四年）是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的一个族弟。在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时候，他就积极参加，随同

洪秀全做宣传工作。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他到了南京，洪秀全封他为干王，任命他为军师，“总理朝政”，一跃成了第二号人物。在此期间，他向洪秀全呈奏了一篇文章，称为《资政新编》。这是他的第一篇施政纲领。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

“事有常变，理有穷通，故事有今不同行而可豫定者，为恒之福；有今不同行而不可永定者，为恒之祸，其理在于审时度势与本末强弱耳。然本末之强弱适均，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得

匪 懈 案

批

批

。则自今而至恒，自少而至大，自有而至固，自固而至万固，亦无不可行矣。其要在于因时制宜，审时而行而已。”（注1）

“因时制宜”是《资政新编》的总精神，也是这篇文章理论上的大前提。洪仁玕从实事求是出发，看到了西方的先进，认为西方强国“技艺精巧，国法宏深”，进而指出“宜先许其通商”，（注2）认为只有通过与其交往，才能向其学习。甚至进一步提出了效法西方，推行已经现成的具体措施。在交通方面，鼓励“

“兴事船”；“兴舟楫”，对发明创造的人，“
 准自专其利”。在金融方面，主张“兴银行”，
 鼓励富商合资或独资设银行。在工矿、邮政
 等其它领域，《资政新编》也提出了很多具体
 办法。特别值得一提的，也是《资政新编》最
 显著的特点，就是主张具体的工业应该交给
 民间的商人去做，国家的作用只是予以提倡和
 鼓励，用政治权力保护私人企业的经济权益，
 以税收的办法进行调节，不必插手。（注3）
 这种自下而上的工业化道路，可称为“商带工”
 道路。

与当时曾国藩在社会所搞的从上而下的“洋
 务”，即以政带工，有着明显的不同。

如果说从鸦片战争以后，向西方学习知家
 行工业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主流，那么
 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由谁来带动工业化这
 个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洪仁玕提出自下而
 上“商带工”的主张，在当时独树一帜。尽
 管由于太平天国洪杨内讧，内部四分五裂，以
 商带工的道路上没有实际走下去，但其主张所反
 映的时代发展的要求，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忽

估的。又如，从「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脉络来考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其时“西学为用”的主张如理解，在“因时制宜，审时度势”精神的指导下，不仅实事求是，而且具有很多创新的意味，这些皆不能因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没有成功而被忽视。

注释

注1：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中国

史稿网

史稿网

史学会主编。

注2：同注1。

注3：同注1。

三、「中体西用」思想确立的历史意义

「中体西用」思想出现在近代历史中绝非偶然现象。一方面它是“西风东渐”的结果；另一方面它是一代一代学者、思想家总结与旧势力斗争的结果。纵观中国两千余封建历史，中国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诸

20X20=400

如先秦文化、西汉文化、隋唐文化、两宋文化
和晚清文化，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对东方以至世界的文化产生过极其深远
的影响。但是长期累月的闭关锁国，封建统治
和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以及习惯性抱残守
缺民族心态，也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一文化的一
大弱点：抵触新事物，排斥新思想。事实上清初，
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已开始渐次传入，
但历时两百余，没有被接纳、吸收，成为中国
自己的东西，从中国的统治者到中国的知识界

历史档案

档案

总以为自己的文化最有用、最文明，当世界
开始发生变化时、当西方已跨入“蒸汽机”时代
时，中国还在自己的老路上沾沾自喜，使成为
国宝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又是社
会进步的负担。

在近代，中国是落后了，政治、经济、文
化都明显落后于西方。西方势力破门而入，使
中国处在新的发生、旧的灭亡的历史转折阶段
。尽管仍然有一种守旧势力不愿接受外来文化
和科学，把使用西方机器视作“奇技淫巧”。

“忤我人心”，（注1）但事实是，不管愿意接受还是不愿意接受，西方势力以各种形式的渗透如同洪水猛兽，势不可挡。如何面对历史与前所未有的转折，特别是在思想文化上如何将其因势利导，可以说「中体西用」思想的确立在一段时期内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新旧混杂、中西融合的过程中起到了中间媒介的作用，使古老的中国从此具有了世界性，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东西都具有了世界内容。中国思想家的所创建的「中体西用」论的实际意义

照 耀 室

批

阅

和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注1：魏源：《筹海筹》，《魏源集》第
八×四页。

原稿纸

第 四 页